

危險的「盛世」

● 羅洪啟



陳冠中：《盛世：中國，2013年》
(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9)。

自從2008年以來，中國大陸內地暗潮湧動。「5·12」汶川大地震，激發了國人久違的民族凝聚力，許多人寄望於這種「凝聚力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；2008年奧運的舉行、2009年的國慶閱兵，激發了愛國主義者的自豪之情，許多人開始期望中國的崛起與「華夏盛世」的到來；「奧運火炬」、「藏獨」、「疆獨」等事件激發了狹隘民族主義者

的愛國熱情，許多人希望中央政府對「分裂主義」及國外「反動勢力」採取強硬立場，以維護中國的「大國形象」；「貴州甕安」、「湖北石首」、「通化鋼鐵廠」、「楊佳襲警」、「鄧玉嬌殺人」等案件則折射出嚴重的官民對抗情緒，許多人寄希望於中央政府能採取有力措施，整肅吏治……

這些情緒或許有隱顯、輕重、緩急之分，卻皆具有濃厚的非理性色彩。歷史的經驗表明，任何一種「情緒」——無論是「愛國主義」、「民族主義」、「共產主義」，或「自由主義」——只要其擴大為一種非理性的思潮，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普遍性的運動，則必然會危及整個社會的穩定，並進而侵害個人的自由與權利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香港作家陳冠中最近出版的《盛世：中國，2013年》(以下簡稱《盛世》，引用只註頁碼)正是對這種潛在危險的一種見微知著的洞見。

陳冠中已在北京生活多年，但一直沒有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小說。據他自己的說法，之所以找到寫此書的「契機」，是因為他覺察到

陳冠中找到寫《盛世》一書的「契機」，是因為他覺察到2008年以後，中國人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許多年輕人都覺得中國已經離超級大國不遠了。所以，此書也可以說是對「中國盛世論」的一種回應。

2008年以後，中國人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許多年輕人都覺得中國已經離超級大國不遠了——正如他在小說中所說的一樣：

經常可以看到國內媒體報導說中國這方面是全球第一、那方面是站在世界前沿。半知半覺間，至少在一般國人的意識中，中國是處處領先了。(頁227)

所以，此書也可以說是對當前所謂「中國盛世論」的一種回應。

那麼，中國的「盛世」會是甚麼樣子呢？陳冠中在小說中給我們作了清晰而具體的呈現：

在經濟方面，自2011到2013年，當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全面的「滯脹期」時，中國的GDP卻連續兩年奇迹般地保持了15%的增長速度，並且內需佔GDP的份額由目前的不到35%增長到了50%。國人工資提升，企業投資回報好，矯正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的畸形發展狀態，還通過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產權徹底解決了農村問題。因此，我們看到，到2013年時，星巴克被旺旺收購，李寧跟阿迪達斯合併，美國、日本等國都得看中國人的眼色行事，更不用說香港、台灣了。

在文化方面，圖書的出版已經取消了書號制度，世界最頂級的畫廊也移到了北京，只要不觸及少數敏感問題，政府都會大力支持各方面的學術研究，並注意保護和挖掘傳統文化與民間藝術的價值，甚至

在宗教問題上也實現了「脫敏化」，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，家庭教會由地下轉變為公開，且蓬勃發展。最有說服力的還是國民幸福指數，到2013年，中國十幾億國民的幸福指數已經連續兩年排名世界第一……

之所以能實現這種奇迹般的「盛世」，得歸功於黨領導下的專制大政府集中資源「辦大事」的優越性——這種「優越性」在汶川地震之後曾被國內許多學者當作「中國模式」的「優點」而加以讚賞。如果說汶川地震救災只是初步體現了這種模式的「優點」的話，那麼，《盛世》一書讓這種模式的「優點」得到了最徹底的展現。作者讓我們看到，專制政府集中資源辦大事的「優點」，不僅能在「區域性」的救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，即便是面對「全球性」的經濟危機，也同樣可以起到「扭轉乾坤」的效果。

小說描述道，2011年初，美元大幅貶值，爆發了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。面對前所未有的「危機」，中央政府果斷地推出了「冰火盛世計劃」(或曰「治國平天下方案」)(頁213)。此計劃的要點在於，利用「危機」，重建業已岌岌可危的政府權威；然後依靠政府權威，順利推行「新經濟政策」，從而化「危機」為「契機」，實現中華民族重新「崛起」的百年夙願。具體操作如下：

首先，當老百姓已被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嚇得人心惶惶的時候，除了對敏感地區(西藏、新疆)立即宣布戒嚴之外，其他地方的國家機器

之所以能實現奇迹般的「盛世」，得歸功於黨領導下的專制政府集中資源辦大事的「優點」，它不僅能在「區域性」的救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，而且即便是面對「全球性」的經濟危機，也同樣可以「扭轉乾坤」。

一律不准出動——等待社會進入暫時的「無政府狀態」時再動。中央高層認為，讓老百姓去親身感受一下「無政府狀態」的恐怖，他們就會懇求國家機器來解救自己，就會心甘情願地委身給國家這個並不可愛的「巨靈」——因為「無政府狀態」比「巨靈」更可怕。結果，一周以後，老百姓便幾乎崩潰；所以，當解放軍、武警部隊象徵性地開進全國六百多個城市時，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百姓的夾道歡迎。而此後進行的針對職業罪犯的「從快」「從重」的三周「嚴打」，也令老百姓拍手稱快——因為在「危機」中，老百姓再次認識到，當遇上大難時，能救自己的只有共產黨——政府因此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絕對權威。

其次，穩定大局之後，中央開始實行有利於民生的「新經濟政策」。最有意義的一項措施是要求「國人所有在境內銀行的個人存款，百分之二十五必須換成國家規範的消費券，三分之一在九十天內、三分之二在六個月內要花掉，逾期作廢」（頁220），以此來刺激消費，拉動內需。其他的措施如放開許多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管制、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產權、打擊貪腐和各種經濟犯罪及價格管制等，即便是最嚴苛的經濟學家，似乎也難以完全否定其「正當性」。

事實上，即便是最不合理的「措施」，陳冠中也通過小說裏的人物去論證其「正當性」。這種雄辯的論證使本書的內容具有了一種「正言若反」的荒誕意味。我們會發

現，小說裏為「干預經濟」、「管制言論」、「愚民政策」等專制措施進行的論證遠比中國大陸諸多「唯國情論者」、「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論者」、「言論自由應當管制論者」的簡單論證更加令人信服——為證明專制的正當性，他幾乎搜集了所有可能搜集到的有利證據。如論及自由派知識份子都已成為務實政府的支持者時，作者通過小說中的作家老陳說：「難道知識份子少批評多建議，實際一點，把精力花在國家需要的課題上，不是更有意義？」（頁136）——通過否定知識份子於事無補的「批判性」來強調知識份子應當與政府合作，不正是國人的一種「通見」嗎？

論及管制言論自由時，作者再次通過老陳說：

西方也有言論和活動的不自由。譬如德國政府就限制納粹支持者的言論自由、美國很多州政府都剝奪同性戀結婚的自由。唯一的差別是理論上在西方，政府權力是人民給的，而在中國，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給的。這差別有那麼重要嗎？（頁137）

通過現實性的言論自由之相對性來否定理想性的言論自由之絕對性，不也常是國人最喜歡採用的一種論式嗎？

當論及不重視法定程序的「嚴打」、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「價格管制」時，作者通過小說中的中央高級官僚何東生引用英國廢除《人身保護令》來解決經濟蕭條、美國

即便是最不合理的「措施」，陳冠中也通過小說裏的人物去論證其「正當性」，使本書的內容具有一種「正言若反」的荒誕意味。為證明專制的正當性，他幾乎搜集了所有可能搜集到的有利證據。

《盛世》一書所描述的「中國盛世」，給人一種如入冰窖般的寒意。在「盛世」、「崛起」、「穩定」的名義下，整個社會被整合為一個龐大而封閉的系統，每一個可能會危及系統目標實現的異己份子，都會被「正氣凜然」地清除。

通過物資管制來調控經濟的歷史，來證明中國採取這些措施的正當性。

甚至對在全國範圍內投放一種改善國民心情的化學藥品MDMA這種最匪夷所思的措施，何東生也認為是無可厚非的（雖然他自己為了避免吃到這種藥品而喝的全都是進口礦泉水）——因為MDMA藥性溫和，人吃了之後不會上癮，也沒有任何副作用，唯一的功效就是會讓人覺得心情特好，覺得世界充滿愛，想跟人擁抱，向別人傾訴心裏話，但頭腦是清醒的，沒有幻覺——既然它能让全國老百姓開心一點，又能增加國家的穩定系數，性價比如此之高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類似的「雄辯」在小說還有許多。而所有類似「雄辯」的終極指向都是為了證明：2013年「盛世」之下的中國，雖然還存在着種種不合理與不完美，但卻已經是「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世界」、「今天的中國，已經找到了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」、「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」（頁245）。

《盛世》一書所描述的「中國盛世」，雖然經濟飛速發展，文化產業空前繁榮，國民安居樂業，快樂指數高漲，但給人所帶來的，卻是一種如入冰窖般的寒意。就此角度而言，此書與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) 和《1984》這些偉大的「反烏托邦」作品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然而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，陳冠中所描述的「盛世計劃」的危險，雖然在於其開始時運用了「馬基雅維里式」的「陽謀」去騙取老百姓的

信任，雖然在於其通過不遵循法律程序的「嚴打」來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，雖然在於其實行排除異己、管制言論自由（如小說中的老陳想買楊絳的書都買不到）、利用MDMA來對國民進行精神麻醉等種種野蠻的專制手段，但最令人恐懼的，卻是此類具體措施中透顯出的以目標為唯一指向的價值考量機制。在此機制主宰下，只要能擺脫自然、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等各種可能會遇到的危機，實現「盛世」、「崛起」的偉大目標，即便是採用非常規手段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因此，這種機制具有強大的邏輯力量，可以「點石成金」、「化腐朽為神奇」：它可以將卑鄙的「陰謀」變成偉大的「計劃」，將恐怖的「暴力」變成崇高的「正義」，將殘忍的「奴役」變成無私的「保護」，將醜陋的「謊言」變成啟蒙的「詩篇」……

在「宏大目標」的籠罩下，遵循「規則」是迂腐的表現，因而不可能實現「法治」；「個人」應當服從「集體」，因而不存在「個人權利」，也不存在個人自由；民主會導致低效率，因而只能實行「集中」；新聞必須服務於目標，因而必須控制……在「盛世」、「崛起」、「穩定」的名義下，整個社會被整合為一個龐大而封閉的系統，此系統內的每一個可能會危及系統目標實現的異己份子，都會被毫不留情地清除，並且是被「正氣凜然」地清除——我代表「國家」與「人民」懲罰你！

在經濟發展、社會穩定的時代，這種以目標為指向的價值考量機制雖然會有一定的市場，但畢竟

不可能成為主宰一個國家的普遍思潮乃至現實性的政策——因為和平時代的人們更加珍視自由、民主等各種權利；而當社會面臨危機時，這種以目標為指向的價值考量機制卻可能大行其道——因為在危機中，擺脫危機、實現「進步」便成了首要的目標。因此，當一個社會面臨重大危機時，強烈的目標指向極易與本文開篇所提及的「民族凝聚力」、「愛國熱情」或「階級仇恨」等非理性的情緒相結合，醞釀為一場可能會吞沒一切的狂熱運動。

我們不會忘記，法國大革命正是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、「人權」的理想目標與「階級仇恨」相結合而成的一場「瘋癲」運動，結果，這場運動固然推翻了君主制，但「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，卻走出來一個醜陋、龐大、超出人類全部想像力的可怕的怪物。這個醜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，不為危險所懼，不因悔恨卻步；它無視一切固有的準則，無視一切常規的手段，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，便被它擊倒」（柏克[Edmund Burke]語，轉引自托克維爾[Alexis de Tocqueville]著，馮棠譯：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[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]，頁43）。

我們同樣不會忘記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納粹的「黨衛軍」、日本的「軍國主義」，也正是在經濟危機的促發下，以「民族復興」、「民粹主義」、「愛國主義」等口號發動的。

正如陳冠中所觀察到的一樣，2008年以後的諸多國人，已視「崛起」或「盛世」為中華民族的首要目

標。甚至，小說中的知識份子、《讀書》雜誌的元老莊子仲還為實現此目標向政府獻了十項國策：

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，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，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，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，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，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，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，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，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，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。（頁120）

這十項明顯具有弔詭色彩的「國策」與《1984》裏「戰爭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無知即力量」（“War is Peace, Freedom is Slavery, Ignorance is Strength”）這三句著名口號，其實並無實質上的差異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其中所謂的「和諧」、「主體」、「民族」、「特色」、「復興」等觀念，不僅對普通國人有極強的蠱惑性與煽動性，甚至也得到了諸多中國大陸專家學者的青睞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假如中國真的遇上了《盛世》一書中所提及的發生在2011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，那麼，出現以「崛起」、「盛世」為目標指向的狂熱運動的可能性是多麼巨大！而面對嚴重的「危機」，即便是在「自由」與「憲政」傳統如此深厚的美國，羅斯福(Franklin Roosevelt)也差點就成為了與希特勒一樣的獨裁者；那麼，在中國這樣根本沒有「自由」與「法治」傳統的國家，會造成甚麼結果，誰又能想像呢？

這便是「盛世」的最危險之處。

假如中國真的遇上了書中所提及的發生在2011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，那麼，出現以「崛起」、「盛世」為目標指向的狂熱運動的可能性是多麼巨大！在中國這樣根本沒有「自由」與「法治」傳統的國家，會造成甚麼結果呢？